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比较与借鉴

杨 姝, 许姗姗, 李 健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课题项目: 2020 年度安徽高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双高计划’背景下, 高职院校服务本土企业海外发展策略研究与路径选择”(编号: SK2020A0870 主持人: 杨姝)。

关键词	摘 要
职业教育 国际化 澳大利亚	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既需要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战略支持, 也需要职业院校实施改革和创新, 增强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通过深入比较研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践, 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特点, 完善顶层设计、强化保障机制、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实现由量到质的突破、建立本土和境外教育同步的国际质量认证体系, 稳固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530(2023)30-0064-06 收稿日期: 2023-08-16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截至 2023 年 1 月, 中国已与 151 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的步伐加快和领域扩大, 国家鼓励职业院校与企业携手“走出去”, 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高职教育发展国际化的趋势如顺水行舟, 然而在推进国际化发展过程中, 境外机构的办学质量监督和保证等问题逐渐浮现, 因此, 有必要深入研究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成果及办学特色。本文通过深入比较研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和实施与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成果和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新时期, 基于命运共同体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办学新模式, 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服务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助力“一带一路”倡议, 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和实施

在澳大利亚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领下, 高等教育机构采取持续稳定的发展战略, 取得了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瞩目成绩。高等教育机构的世界排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留学生数量和本土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持续增长, 跨境教育项目开发出新模式, 高校设立海外独立办学机构的范围不断扩大, 并改革原有“学徒制”和“培训生制”, 发展出机制灵活的“新学徒制”。

(一) 顶层设计与基层巩固并驾齐驱

为了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发展战略, 澳大利亚在政府及州和领地层面建立了有效的框架, 制定政策法规, 完善顶层设计, 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战略支撑。联邦政府在 2016 年先后出台了《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战略 2025》和《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路线图 2025》, 前瞻性地列出未来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事

业的框架和发展路线。在地方层面,每个州和领地都有国际教育发展行动计划和纲领性文件,并配备充足的人员和资源来保障制度的实施。在维多利亚州,国际教育已成为该州近十年最大的出口服务业,为此维多利亚州教育培训部、经济发展和就业部联合交通和资源部共同专门为国际教育事业提供专家和方案支持。此外,维多利亚州还专门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亚洲分别设立其全球教育网络办公室并聘请教育服务领域的专家^[2]。除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澳大利亚各地都有专门的协会来推进教育国际化工作的开展,比如澳大利亚国际学生委员会(CISA)、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IEAA)。这些协会中有来自学术界的代表和行业专家,会针对不同的受益群体定期举行不同主题的大型会议和论坛等,扩大国际教育在学术界和社会的影响力。

政府部门从宏观角度制定战略、聚集资源和把握方向,职业院校负责实施战略将国际化落到实处。职业院校的管理层均普遍认同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各校的短期和长期战略、计划和年报中,国际化工作的目标和具体实施以及取得的成就都非常详尽。1995年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调查表明,澳大利亚的所有高校都专门出台了国际化方面的文件和实施战略^[3]。墨尔本大学在2011—2014年的战略规划中用整整一页详细地描述了该校的国际化发展愿景,在2015—2020年的战略规划中明确将从综合角度扩大该校的国际化工作的范围^[4]。目前,澳大利亚高校在加拿大、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和南非等地已建有多所海外分校。高校对于开展国际化工作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各校根据自身特色制定具体策略和探索适合的国际化发展模式。

(二)“引进来”与“走出去”双管齐下

澳大利亚政府在2000年通过《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2000》(ESOS),为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享受优质教育服务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此外,还针对性地启动新哥伦布计划,赞助澳大利亚本土学生到印度太平洋区内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短期或长期研修或实习^[5]。2014年,在澳大利亚高校注册的留学生数就占到其在校学生数的34.7%,单就海外分校的留学生数量而言,澳大利亚的8所高校稳居全球前15位^[6]。留学生的学费直接产生的收入为47亿美元,占澳大利亚高校年收入的17.3%^[7]。2020—2021新南威尔士州TAFE年度报告显示,即使在全球疫情肆虐的2020年,国际学生的注册率仍旧增长了16%^[8]。

学生的国际流动性作为推动国际化的重要策略,不

仅包括“引进来”的留学生的数量,还包括“走出去”的本国留学生的数量。2009年本土具有海外留学生经历的大学生占比8.8%,2013年涨至14.8%,超过美国成为大学生赴境外留学生比例最高的国家^[9]。高等职业院校还与海外院校共同建立合作项目或者机构培养高技能学历人才。以墨尔本理工学院为例,2009年,该学院在海外的合作院校就包括大连交通大学、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等23所高等院校,覆盖中国、韩国、新西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10]。2014年,该校的境外合作机构毕业生共计2617名^[11]。2020年,仅与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院校就达9所,即使受疫情影响,新增留学生数量仍旧达到了495人^[12]。此外,高等院校教职工也充分融入教育国际化工作,除了在澳大利亚与诸多国家开展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中从事教学和管理以及质量监督工作,也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展科研工作,2011—2015年数据显示,澳大利亚高等院校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中,45.3%是本国教师协同其他国家的研究成员共同完成的^[13]。

(三)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同轨推进

2011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法案通过了成立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TEQSA),取代了之前由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AG)设立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署(AUQA)。这项改革给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设立了100条新的标准,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广泛征求高校相关部门和行业建议形成了2015高等教育标准框架(HESF),从7个方面对高等院校进行规范和要求,从而确保高等教育质量,包括学生参与和成就、学习环境、教学、研究和研究培训、机构质量保证、管理和问责、信息和信息管理。其中重点关注对高校学生的保护,包括国际留学生权益的保护^[14]。标准5.3.7条提出“根据定期内部监控、综合检查、外部参照和学生反馈的结果来减少办学质量的潜在风险,评估改进和引领发展”^[15]。这些标准从制度上规范和保证高等教育学术机构的办学质量。此外,顶尖学术结构也都相应出台严格的质量认证体系。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即澳大利亚享誉国际的八所顶尖综合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联盟,共同推行一套质量认证体系(Quality Verification System),其认证标准不仅在联盟成员之间执行和互认,也给本土的其他高校提供了质量认证的参考^[16]。

为了保障跨境职业教育符合本土职业教育的质量要求,澳大利亚于2005年发布《跨国教育与培训国家质

量战略》，规范和管理其境外教育质量，并积极深化合作推进教育领域的国际标准认证。《悉尼协议》是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加拿大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工程教育学会共同签署的国际工程教育资格互认协议，从培养目标、学生发展、毕业要求、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支持条件、持续改进七个方面提出了标准，特别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和持续改进的三大核心理念，为工程类专业建设提供了国际标准，构成了工程教育与工程师国际互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7]。澳大利亚还注重开发国际资格证书与认证课程体系。国家质量委员会（NQC）批准职业院校与行业技能委员会、澳大利亚创新和商业技能委员会（IBSA）共同开发 TAE 培训与评估证书（Certificate in Training and Assessment）。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行业委员会基于国家 TAE 培训和评估教师资格证书课程体系开发了职业教育国际教师资格证书（International Skill Training Courses），融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分类标准（2011）和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TVET）标准^[18]。这些课程体系和证书标准突出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体制、理念、课程设计、教学组织、教学方法及标准、实用课程的创新设计、教学评估等，已被广泛用于亚太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效地增强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在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度，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成果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指引和地方高校的努力下，国际化工作有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阻碍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也逐一浮现。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国际教育仍主要来源于外部政策推动，自身缺乏内在驱动力。教师和学生的国际流动数量和质量虽呈逐年增长态势，但跟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相比仍有待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境外办学质量缺乏监督和规范。

（一）高等职业院校自身缺乏内在驱动力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从宏观层面首次明确高职教育的历史使命，即培养“一带一路”急需高技能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配合行业企业“走出去”。2019年，“双高”文件出台，要求高职院校紧密与行业联系，深化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就业创业等领域的合作，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

也明确要加强职业院校与境外中资企业合作。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从顶层设计上确保了高职院校国际化建设的政策保障。

配合国家政策，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配套制度服务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浙江省率先出台《关于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的意见》《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文件，明确要求本地院校要稳妥有序地开展境外办学，探索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丝路学院”^[19]。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中连续三年稳居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榜首的江苏省在《江苏省“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中就详细阐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战略目标并细化和量化了相关指标。2019和2020年分别出台《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和《江苏省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0—2022年）》，鼓励职业教育跨境合作，加速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江苏省还专门出台《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专项资金资助来华留学生，降低留学成本^[20]。

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出台各项政策鼓励职业院校发展跨境合作，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但调查表明，职业院校发展教育国际化工作的主要动力仍源于国家政策的被动驱动，缺乏学术机构内部自生的主动意愿^[21]。首先，职业院校发展国际化工作的整体氛围不强，管理主体没有意识到教育国际化给职业院校本身以及社区和社会带来的潜在积极影响，因此，没有前瞻和详细地列入职业院校国际教育工作发展规划。其次，教师的国际化素养和教学能力的不足也成为阻碍国际教育工作发展的障碍，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体系缺乏稳定和优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教师语言能力薄弱等问题。再次，在教育国际化上有限的经费投入限制了该项工作的推动。《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等教育经费结构不协调，高职专科2022年投入了2758亿元，仅占高等教育整体投入的19.7%，不足普通本科高校的四分之一。尽管已建立了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来给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经费保障，但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情况有待推进。2021年，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未达到12000元水平的省份占比12.5%。与2020年相比，生均拨款水平“不增反降”的省份占比高达50%^[22]。与国际教育给职业院校和当地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澳大利亚等国相比，国际化工作给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带来的经济收入十分有限甚至处于亏损，国际教育工作的投入和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不成正比，没有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

削弱了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的信心和动力。最后,中国职业院校没有充分发挥行业和协会的作用,未能利用其影响积极协调政府、企业和院校三方的关系,积极发展境外职业教育。

(二) 国际流动缺乏活力

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征就是学生的国际流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高职院校从共建国家招收的留学生数量逐年增长,但同职业教育较发达的国家相比,留学生数占比相对较小,学生的国际流动性缺乏活力。高职院校缺乏有效的留学生招生途径,很大程度上依赖第三方中介宣传招生,且主要来源地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普遍较低且生源不足,为了吸引留学生来完成国际化办学指标的考核,高职院校不得不再降低入学门槛,出台如提供全额奖学金、生活费甚至更多的政策来完成招生任务,因此,招收的生源质量与既定的培养具有国际素养的高技能人才目标相悖。此外,职业院校对留学生培养质量缺乏专业评估和统一规范,有些省份在实践中依托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学会等第三方评估,有些院校通过自检自查,难以保证留学生培养的质量。

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上可以看到,目前,我国高等专科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1077个^[23],职业院校学生通过中外合作项目和境外游学计划等方式实现海外学习经历的数量正在逐年增长,但数量占比远不及高达14.8%的澳大利亚等国。值得注意的是,高职院校正在结合自身特点,探索带有我国高职院校特色的教育国际化发展举措,并针对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技术人才需求的状况,与“走出去”企业共建海外技术人员培训基地,2021年,实现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达241万人次,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人数达62.6万人次^[24]。

(三) 海外办学质量缺乏保障

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以“鲁班工坊”和“丝路学院”命名的具有中国职业教育特色的境外办学机构,体现出高职院校境外办学能力提升,品牌意识增强。天津市牵头成立了全国“鲁班工坊”建设联盟和“鲁班工坊”产教融合发展联盟,联合高职院校和企业共同推行中国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目前已在亚非欧19个国家建成20个“鲁班工坊”,助力“走出去”企业开拓海外市场^[25]。另外,一个代表性的境外办学机构就是浙江省打造的“丝路学院”,入选的“一带一路‘丝

路学院’”已在国境外开展职业培训,在当地树立起中国职业教育品牌。但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目前没有专门的质量保证机构和完善的机制来规范和保证境外办学的质量,因此,建设综合全面、多方参与和认可的质量保证体系是当下迫切的任务。

此外,国际化专业与课程标准应用范围有限。我国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数和课程标准数呈持续增长态势,但主要集中在高等职业教育欠发达的东盟、非洲和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东盟国家认可和采用的标准占比近30%,而欧美发达国家占比极少^[26]。一些院校只是为了完成“双高”国际化任务指标,开发出的国际标准适用主体单一且无法推广。一些国际化课程本身的框架和内容缺乏专门质量认证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很难被职业教育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认可和推广。因此,职业院校需加强和行业的联系与合作,共同开发出兼具实用性和推广性的国际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

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本土借鉴与启示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化取得的瞩目成绩和突出成果源于其不断创新和改革原有体制,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需自上而下强化保障机制,统筹设计与规划,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实现由量到质的突破。

(一) 强化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国际教育事业的保障机制

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法规体系。现有政策主要集中于宏观领域,不仅在微观层面缺乏足够的配套政策支持,也缺乏职业教育国际化专门性政策法规,因此,在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和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过程中,应加速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化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如制定专门的职业院校国际合作交流和国际化办学政策。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以下两点:一方面,职业教育国际化相关政策要能够彰显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专业设置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相关政策仍包含在教育国际化范畴中,没有将职业教育单独列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给予其针对性的政策指引。另一方面,要充分征询教育行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的意见。教育行政部门在宏观战略制定和政策指引上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和提出重要意

见;行业主管部门则可以依据产业发展的形势和企业发展需求,与地方共同出台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相关细则,让政策能够真正落地落实。因此,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法规的质量以及稳步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是顺应职业教育体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建立国际化信息交流平台。我国职业院校与国外职业院校、企业和行业以及政府的多方交流互通缺乏一个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因此,建立针对职业教育发展国际化的公共交流平台有利于推进各国职业教育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27]。首先,各国职业院校成员能够根据各自的发展愿景和平台提供的公开信息寻找合适的合作办学伙伴,减少不必要的第三方周转,畅通合作途径,减少合作办学成本。其次,各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教学主体可以利用优质教学资源,提升国际合作办学的教学质量。科研主体能够借助平台开展职业教育国际研究,扩大国际合作范围和提升国际交流质量。教师参与国际交流项目中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助于加强教师队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提高教师的国际化素养,提升教师的语言能力,打造优质“双师型”队伍。最后,借助平台实现校、企、行、政四方联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不仅与产业联系紧密,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国际信息交流平台实现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和政府的高效实时沟通,加强各参与方的分工协作和互动交流,拓展合作内容,创新合作形式,提升合作效率。高等职业院校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领下,将国际教育的发展纳入院校的年度规划等指引学校发展方向的重要文件中,并详细列出国际化工作的发展目标和具体实施等,根据自身特色探索适合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同时通过缩小国际化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的鸿沟,培养国内外产业不可或缺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为产业赋能,推动职业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打造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二) 巩固“引进”,扩大“输出”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功在境外建立起如“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体现中国职业教育特色的办学机构。因此,各地职业院校需因地制宜结合学校发展实际,在政府牵头引领下,与“走出去”企业发展产教融合联盟,共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开展企业技术培训,服务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安徽本土已经形成一批聚焦新能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等行业领先技术的龙头企业,如奇瑞汽车、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埃夫特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这些企业都在海外设有工厂且急需汽车、工业机器人、机械等技术技能员工,当地的职业教育及培训机构已满足不了企业的用人需求。因此,本地的职业院校可以聚集资源,“组团出海”,充分发挥各校专业和师资优势,建立海外分校或者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开展“中文+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打造校企“走出去”共同体。

能够实现职业教育“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科学规范的国际化职业教育标准和国际化课程体系。专业教学标准是专业顶层设计成果的集中体现,其开发要坚持规范和科学的专业建设范式。具体可以借鉴《悉尼协议》签署成员国的做法:首先,建立科学的标准开发工作组织体系,设置专门机构,由上而下对标准开发进行专业和科学的统筹安排,为各行业指导委员会提供相应的指导;其次,制订明确的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计划,对整个开发过程严格监控;再次,要明确行业专家、课程专家和学校教师等参与主体在整个开发过程中的不同职责和任务等,协调各主体充分发挥各自功能;最后,职业院校参照国家层面专业教学标准制定国际化的专业教学标准,并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和持续改进的三大核心理念,同时融入培养目标、学生发展、毕业要求、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支持条件、持续改进等内容,结合目的输出国产业升级需求,切实深入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与“走出去”企业共同推动职业教育标准在海外的推广和运用。

国际化职业教育标准的实施和推广需要有国际化课程体系作为支撑。随着国际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职业教育体系需从主要靠单一引进转变为全面和深入的国际化课程体系融合,深度开发课程标准和资源。在原有引进的国外课程和证书的基础上,优化课程结构,拓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共建课程体系、双语教材、教学资源库、实训基地,联合行业和企业全面参与课程设计、开发和评价全过程,将产业发展需求有机融入课程内容,实现国外优质资源本土化,形成中外对接、产教融合的国际化课程和培训体系。

在提高“输出”资源质量的基础上,优化来华留学生培养计划。目前,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目标的不明晰源于对“走出去”企业的目标国的产业发展调研不够,此外,培养过程未充分践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办学特色。职业院校应以支持“走出去”企业的海外发展和服务目标国产业发展为宗旨,深入调研目标国职业教育发

展情况和当地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缺口,与企业和行业共建契合企业海外发展和目标国产业发展的留学生人才培养机制,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度。

(三) 规范本土和跨境教育质量评估机制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层面仍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估机制,评估工作通常与普通教育一起开展,难以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因此,广泛征求各方建议,形成以政府主导、职业院校为主体、企业行业积极参与、第三方机构独立评价的四位一体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估机制势在必行。须从内部监控、综合检查、外部参照和学生反馈等多维度对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进行规范和管理,同时完善跨境教育的标准,保证跨境教育的质量符合本土职业教育的标准和要求。

建立科学的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评估的目的是发现我国职业教育在走向国际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同类型、不同方向的问题,总结和提炼既有经验,提升国际化办学质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模式。因此,作为评估主体的职业院校可以依托中国-东盟等国家战略合作机制,借助行业和协会的力量和影响,扩大和深化职业教育多边合作机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成立国际教育联盟,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科研等合作,签订多边国际合作协议、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专业标准互认协议和国际职业资格标准互认协议等,提升跨境教育质量,扩大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政府作为主导方,在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评估机制的过程中,需明确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使各参与方在推进过程中可以找到参照的依据。企业和行业需根据行业发展基础、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结合职业院校的发展现实以及优势与特色,优化和完善指标体系,共同提升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参考文献

- [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EB/OL]. (2022-08-15) [2023-04-25].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 [2]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ector Strategy: Victoria's Future Industries [EB/OL]. (2023-04-13) [2023-05-18]. <http://www.business.vic.gov.au/futureindustries>.
- [3] K. BACK, D. DAVIS, A. OLSEN. 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Goals and Strategies [M].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6: 6.
- [4]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Strategic Plan 2015-2020: Growing Esteem [EB/OL]. (2023-04-18) [2023-05-20]. https://about.unimelb.edu.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6/15343/11364-GROWING-ESTEEM-2015-FA-WEB.pdf.
- [5] G. GOOZEE. The Development of TAFE in Australia [M]. Adelaide: 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Ltd, 2001: 100.
- [6] W. LAWTON, A. KATSOMITROS.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Data and Developments [M]. London: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2012: 3.
- [7] F. LARKINS, I. MARSHMA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Overseas Student Recruitment: Financing Strategies and Outcomes from 2004 to 2014 [M]. Melbourne: LH Martin Institute, 2016: 4.
- [8] [18] TAFE NSW. TAFE NSW Annual Report 2020-21 [M]. Sydney: TAFE NSW, 2021: 10.
- [9] A. OLSEN. 2014 Research Agenda: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Directors' Forum [R]. Redhead: Strategy Polic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14.
- [10] Melbourne Polytechnic Annual Report 2009 [EB/OL]. (2010-02-22) [2023-05-15]. <https://www.melbournepolytechnic.edu.au/media/4468/annual-report-2009.pdf>.
- [11] Melbourne Polytechnic Annual Report 2014 [EB/OL]. (2015-02-26) [2023-05-16]. <https://www.melbournepolytechnic.edu.au/media/4468/annual-report-2014.pdf>.
- [12] Melbourne Polytechnic Annual Report 2020 [EB/OL]. (2021-03-29) [2023-05-17]. <https://www.melbournepolytechnic.edu.au/media/4468/annual-report-2020.pdf>.
- [13] Scopus data [EB/OL]. (2016-09-12) [2023-05-18]. <https://www.scival.com>.
- [14] K. LEE DOW, V. BRAITHWAITE. Higher Education Review of Regulation Report [R]. Canberr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3.
- [15] B. PROBERT. The quality of Australi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ow it might be defined, improved and assured [R].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Offic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5.
- [16] Sydney University. 2016-2020 Strategic Plan [EB/OL]. (2016-03) [2023-05-17]. <http://sydney.edu.au/dam/intranet/documents/strategy-and-planning/strategic-plan-2016-20.pdf>.
- [17] 唐正玲, 刘文华, 郑琼鸽. 《悉尼协议》认证标准及其对我国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的启示 [J]. 职业技术教育, 2017 (4): 75-79.
- [19] 袁勇. “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浙江样例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2 (21): 62-67.
- [20] 陈越, 蒋家琼. 高等职业教育多元共治的架构、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分析 [J]. 高校教育管理, 2022 (3): 57-67.
- [21] 刘文霞. 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的合作模式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22.
- [2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 全国职业高等院校校长联席会议. 2022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111.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 由地方审批报教育部备案的机构及项目名单 [EB/OL]. (2023-05-17) [2023-05-18]. <https://www.crs.jsj.edu.cn/index/sort/1008>.
- [24] [25] [26]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 全国职业高等院校校长联席会议. 2022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66, 63, 64-65.
- [27] 丘懿, 何正英, 杨勇. 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 基础、遵循与借鉴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 (29): 34-41.

(编辑 刘阳阳)